

看世界

袁勇

国际能源署的石油稳价术

随着中东局势骤然升温，全球能源市场开始剧烈波动。就在市场恐慌情绪蔓延之际，国际能源署（IEA）3月11日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全球石油供应紧张局面。

这是该机构自1974年成立以来第六次集体释放石油储备，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释放量大致相当于霍尔木兹海峡约20天的石油运输规模。

这则消息，让战略石油储备机制又一次被置于全球聚光灯下。

战略石油储备机制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973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当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产油国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并大幅削减石油产量。短短数月间，国际油价上涨约4倍。当时，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多国石油都高度依赖进口，各国迅速陷入能源紧张局面，加油站前排起长龙，通胀指数大幅攀升，经济活动受到严重冲击。

这场危机让西方国家深刻认识到，在石油供应这个“壮汉”面前，他们引以为傲的工业体系脆弱得如同“婴儿”一般，必须想办法建立一个“缓冲带”，为自身以及同样脆弱的全球经济体系留下宝贵的时间窗口。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主要工业国开始推动建立国际能源协调机制。1974年11月，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框架下，国际能源署正式成立，各成员国经协商建立起战略石油储备制度、石油紧急共享机制以及能源信息共享体系，并同意共同协调能源政策。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要求，每个成员国“必须确保”相当于至少90天净进口量的石油储备水平，并随时为应对可能出现的严重供应中断做好准备。在储备形式上，国际能源署明确了3种主要方式，分别为政府储备、企业储备和机构储备。其中，政府储备由政府直接出资建设和控制；企业储备包括义务储备和商业储备；机构储备则是法律规定由公共组织承担的义务储备。截至目前，成员国共持有超过12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约等于全球12天的消费量。此外，还有约6亿桶企业储备也可作为协调之用。

根据这份制度设计，当全球石油市场出现异常波动，尤其是出现可能触发石油供应中断的苗头时，国际能源署将召集成员国召开紧急会议，对全球能源形势进行进一步评估，并讨论是否启动集体行动。一旦决定实施，各成员国便按照协商确定的比例向市场投放储备，以稳定供应预期。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战略石油储备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库存安排，更是一种政策性调节工具，即通过影响市场预期来平抑油价。

石油市场高度全球化和金融化，油价对各种外部因素极其敏感。而且，由于石油需求弹性较低，即使短期供应只发生小幅变化，也可能引发市场恐慌，导致油价剧烈波动。

反之也是同样道理。有专业媒体测算，国际能源署战略石油储备“最大理论释放能力”大约为440万桶/天，对应全球每天约1亿桶的石油供应需求，占比为4%到5%。从绝对比例看，这个数字并不算很大，大致相当于一个中等产油国的产量，但在现实中，这样的边际供应变化已经有能力影响未来一段时期内的价格预期。

可以说，战略石油储备制度正是通过这种“杠杆设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球能源市场的博弈结构，使石油消费国从单纯的“价格被动接受者”，逐渐转变为有能力参与市场调节的“边际玩家”。

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一机制确实多次发挥了稳定市场的作用。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国际能源署曾组织成员国实施了两轮协同行动，累计释放约1.827亿桶石油储备。这一行动在短期内缓解了市场对石油供应中断的担忧，并在一定程度上压低了油价。

不过，战略石油储备的作用也存在明显局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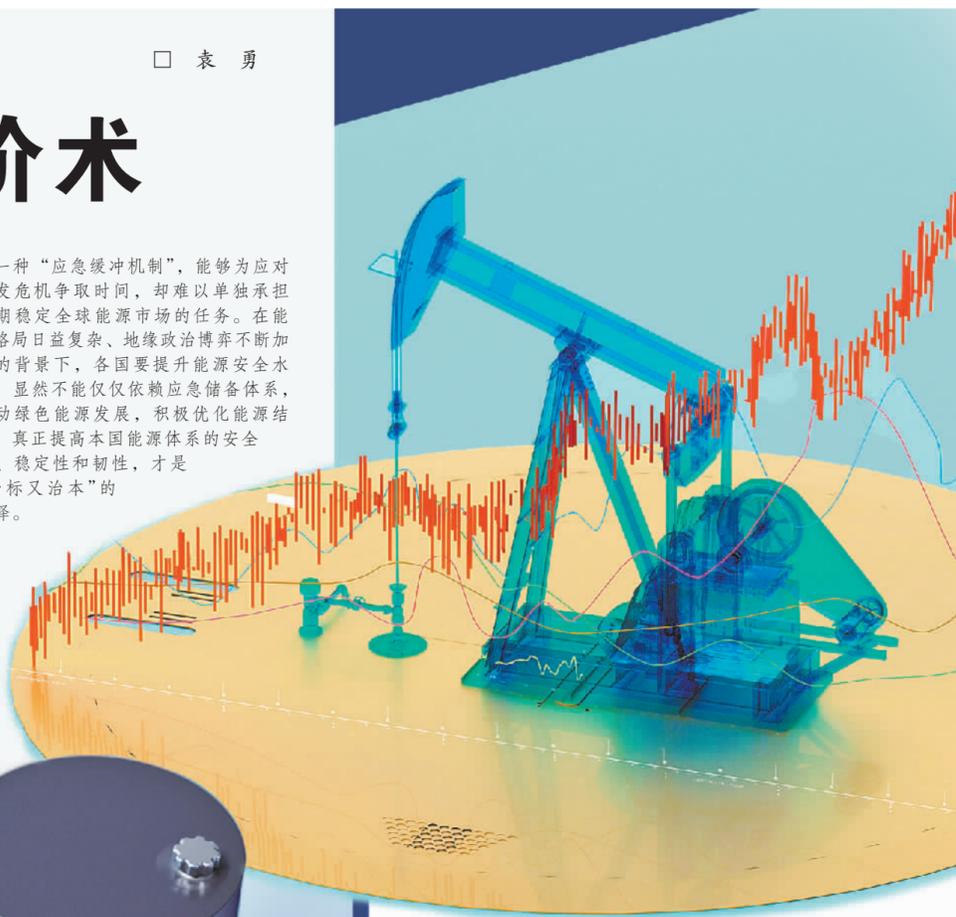
首先，它对市场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短期特征。释放储备虽然在危机爆发初期缓解阶段性供应紧张局面，但却无法改变全球石油供需的长期格局。一旦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升级，或者全球能源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油价依然会按照市场基本面重新调整。因此，有市场分析师将战略储备形容为“止痛药”，认为其只能带给市场“这个世界还好”的“幻觉”，其积极意义有限。

其次，战略储备本身也是一种有限资源。如果供应中断持续时间较长，储备终究会有耗尽的一天，届时，巨大的供应缺口将张开“血盆大口”，吞噬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财富。

最后，战略储备的使用还面临政策与市场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如果过于频繁地动用储备，可能会扭曲市场价格信号，削弱市场对供需变化的敏感度；但如果太过依赖市场自我调节，或是释放储备的“动作太慢”，又可能错过平抑油价的最佳窗口期，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因此，国际能源署以及各国政府对于这一工具的使用通常非常谨慎，真正大规模释放储备的次数并不多。

综合来看，战略石油储备只

是一种“应急缓冲机制”，能够为应对突发危机争取时间，却难以单独承担长期稳定全球能源市场的任务。在能源格局日益复杂、地缘政治博弈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各国要提升能源安全水平，显然不能仅仅依靠应急储备体系，推动绿色能源发展，积极优化能源结构，真正提高本国能源体系的安全性、稳定性和韧性，才是“治标又治本”的选择。



“今年年初的马面裙海外订单量，大概是去年同期的10倍！”山东曹县晟名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侯国栋自豪地说。

中国马面裙的海外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侯国栋所在公司的快速发展，正是一个生动缩影。

侯国栋告诉记者：“过去是外国客户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最近一年，我们在汉服设计中巧妙融入国际时尚元素，激发客户新需求。”近年来，企业还通过参与各类国际汉服展销活动、入驻跨境电商等新营销模式，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并爱上马面裙。

马面裙是汉服体系中极具代表性的形制，其特点为前后平整、两侧打褶，因裙门形似中国古城墙的“马面”设计而得名，也是现代汉服复兴浪潮中最受欢迎的品类之一。作为马面裙乃至整个汉服产业的重要地标，山东曹县的产业数据便是这一潮流最直观的注脚：曹县2025年汉服销售额突破130亿元，汉服企业超过2800家，汉服从业人员近10万人，成为全球重要的汉服产销基地之一。

“从原创设计到裁剪制版、绣花印花，再到辅料供应、网络营销和售后服务，我们在方圆5公里内完成了全产业链覆盖。”曹县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副主任刘霞说。

曹县马面裙凭借完整产业链支撑起高效生产，并在全球市场中展现出蓬勃的产业生命力。

肯尼亚一家服装公司的董事长马晓梅告诉记者，她在服装制造业深耕多年，现已注册更贴近肯尼亚当地市场的曹县汉服商标，并将其定位为节庆及舞台表演服饰。当地消费者默茜·马伊纳评价：“马面裙是一款能瞬间提升整体造型质感单品，既可日常穿着，也适合出席剪彩仪式等正式场合，绝对百搭。”

巴西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的总经理陈翔广正与当地销售商探讨更深度合作，计划将曹县马面裙与欧美奢侈品牌在一个店铺同步展销，展现中国马面裙在全球服饰产业领域的独特魅力。

当产业触角逐渐深入全球的商业肌理，曹县马面裙也正在进入全球消费者的衣橱。莎拉·尼亚维拉是肯尼亚内罗毕一家旅行社的经理，自从在当地时装店购买一条曹县马面裙后，已多次身着马面裙出席活动。如今，她正计划一个更大胆的尝试——让马面裙登上即将在当地举办的世界汽车拉力锦标赛。“这是一项极具影响力的活动，我们打算身着马面裙参与其中。”

意大利工业设计协会中国业务负责人李明说：“我第一次接触曹县马面裙，是在米兰一场汉服走秀上。裙摆上精密繁复的织金图案，与意大利高定的工艺细节竟有着奇妙的共鸣。”李明认为，曹县马面裙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非博物馆里仅供观赏的展品，而是一套“活”的时尚系统。

肯尼亚时装模特尼亚夸尔·约翰对此深有感触。她与曹县马面裙的缘分，始于一偶然社交媒体“刷屏”。“初次见到马面裙时，它看上去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穿法也很特别，深受模特群体欢迎。”后来，她曾两度穿马面裙走秀，反响很好，“以后我还会继续穿”。

记者了解到，曹县目前已推出月华裙、凤尾裙等多款汉服款式，在色彩、纹样、图案等设计元素上积极融入国际语境，探索一条“文化+时尚+产业”的出海路径。

“我们推出的不仅是普通汉服，更是一套从产业实践中生长出来的、可体验的文化推广方案。”山东省服装行业协会会长周锦说。

2025年，曹县以马面裙为主的汉服销往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等32个国家和地区。目前，曹县正通过推广汉服走秀、成立海外汉服社等活动，不断提升曹县汉服的海外市场占有率。

当曹县马面裙在米兰的阳光下、内罗毕的校园里、里约热内卢的舞池中轻轻摇曳，它背后连接的，是一座中国县城以数字化和产业化方式，让世界看见东方美学的当代实践。

刘铮
李卓群

马面裙

悦读

孙昌岳

AI光环下的隐秘角落

在硅谷精英为人工智能（AI）时代欢呼之际，一份横跨六大洲的实地调研，将目光投向了这场智能革命光环之下的隐秘角落。

英国学者詹姆斯·马尔登、卡勒姆·坎特、马克·格雷厄姆合著的纪实类图书《投喂AI：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底层工人纪实》，揭示了一个颠覆常识的经济现实：当前的AI看似“智能”，但其根基并不是“由代码独自堆砌而成的”，而是深植于一个分布于全球、高度剥削的古老人力网络中。

作者举例，自动驾驶汽车能识别行人，大语言模型能提供信息，

所有这些都并非“智能的魔法”。其训练依赖海量经过人工清洗、标注的数据，而这份最基础、最耗人力的工作，大多流向了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全球南方国家。在乌干达，数据标注员安妮塔每天工作超9个小时，时薪约1.16美元，为远方的自动驾驶系统逐帧标注图像。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单调的重复”，还是一场严密数字化监控下的“压力测试”：休息时长被精确限定；识别准确率必须维持在95%以上；大多数人只能获得短期合同，这意味着失业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们。根据相关调查，从事此类工作的合同工普遍存在焦虑情绪，

部分人正处于“心理创伤阴霾笼罩下”。换言之，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沉向下的产业调查，更是一部血淋淋的劳工权益报告，是一份关于“全球经济权力在数字时代重组与固化”的扎心经济学样本。

将数据工作外包给全球南方国家，本质上是平台经济逻辑的延续与深化，是一种基于全球既有不平等结构的成本压缩策略。高速互联网的普及，使得数据可以瞬时抵达世界任何角落，企业转移业务的边际成本无限趋近于零。这催生了一个极端竞争环境下的全球劳动力市场。从菲律宾的标注中心到肯尼亚的审核工厂，各地劳动者为获取硅谷科技巨头的合同而不得不竞相压价。一种普遍的生存意识由此形成：如果你不够快、不够廉价，工作瞬间就会流向地球的另一端。在此模式下，技术进步催生的巨额红利，并未沿着产业链的延展方向公平扩散，反而加剧了赢家通吃的垄断格局。

作者援引同行的分析报告指出，大型科技公司的AI竞赛与历史上的帝国扩张颇为相似。“它们不仅榨取廉价劳动力，还大规模占有数据资源，消耗水电等自然资源，并试图垄断关于AI未来的定义权。”与此同时，科技公司通过投资、人才垄断和游说，深刻影响着AI的监管规则与公众认知。这种基础设施权力与数据权力的结合，使得少数巨头掌握了前所未有的经济与文化影响力。在此结构下，全球南方国家往往被固化为提供原始数据的“资源供应商”，

以及承受生理、心理与环境代价的“数字殖民地”，在技术与治理的核心对话中持续缺位。

面对这些系统性困境，寻求变革与全球治理的呼声日益高涨。从印度数据工作者尝试联合到欧盟推动数字劳工权利立法，局部改善的努力已然开始。国际机构呼吁，科技巨头必须为其价值链上所有工人的福祉承担责任，确保他们获得足以维持生活的工资、起码的安全保障以及基本的心理健康支持。

另有学者指出，AI的发展路径本身也值得反思。相较于追逐“全能”但耗费巨资的通用大模型，开发针对医疗、环保等具体领域的专用AI，或许是更高效、更公平的选择。

《投喂AI：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底层工人纪实》一书的价值在于，它撕开了技术中立的神话，将AI还原为一种深刻嵌入全球政治经济关系的生产系统。它迫使读者审视：我们期待的技术进步，最终在强化谁的利益，又由谁承担成本？当效率与公平的天平严重倾斜，所谓的“智能革命”能否承载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普遍向往？这些问题，不仅关乎经济增长的质量，更关乎数字时代的社会公正与文明走向。



本版编辑 韩叙玉—伊美 编 倪梦婷
来稿邮箱 gjb@jrb.cn